

列宁道路

LENIN

2022年 • 春节刊

目录

《列宁道路》2022 年开年的话	2
纪念十月革命 104 周年	4
不应支持特色政府的对台主张.....	7
三个历史决议的三种历史意义.....	10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17
论我国革命	23
论我国革命（二）	26
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 发展（以中特为例）	32
《火星报》创刊的平安夜和苏联解体的圣诞节	43
中国舆论场的二元陷阱与缺席的革命左派：从“南京大屠杀争议言论”说起	47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三个阶段.....	56
列宁如何制定纲领.....	61
书评：《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66
论我国革命（四）——帝国主义时代与我国的统治阶级.....	72

《列宁道路》2022 年开年的话

2021 年是《列宁道路》创刊的年份。在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前夕，《列宁道路》发布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列宁的建党策略比中毛共的建党策略高明在哪里”。直到岁末为止，频道总共发文 23 篇。有 230 余位读者订阅了这个频道。平均而言，每个星期频道会发布一篇文章，每篇文章能够吸引 10 位读者订阅。点击量最高的文章是 9 月 25 日的《评孟晚舟回国》，有 1600 余次的点击量。这篇文章的主要立场是反对黑帮民族主义的。阅读量最高的是 5 月 4 日的《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虽然只有 900 次的点击，但有 600 人次的读者读完了这篇尝试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并为未来指明方向的文章。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成就。我们敝帚自珍，更多是因为这个频道所反映出的原则立场，有着先团结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然后共同走向工人阶级的潜力。我们拒绝承认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府，认为它是需要用革命手段扫除的帝国主义的专制政府，是法西斯黑帮。只有无产阶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觉悟和组织起来，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为了形成这个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必须有秘密的、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此之前，即组织上的一致之前，必须有理论上、政治上的一致。而《列宁道路》自觉确认的使命，就是奋力去促进这理论上、政治上的一致。

这双重的使命，产生了新的一年中急需进行的两方面的工作。为了得到理论上的一致，我们自己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介绍。之所以特别强调列宁主义，并非是我们轻视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而是因为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是帝国主义的专制政府，列宁的道路因此有了许多直接借鉴的意义。我们热烈地呼吁我们的读者努力地去阅读列宁革命时期的著作，特别是《列宁全集》第 4 卷至第 8 卷的内容(这是理解当前任务最有参

考价值的文献)，并结合着中国的现实情况加以思考。为了得到政治上的一致，我们需要去回答一些迫切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搜集现实材料并分析与论证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着手之处等，然后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回答的基础上提出一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我们准备把这份纲领强加给其它小组，而是准备在有分歧的地方寻求统一。可是如果没有纲领，那么各个小组之间的以个人联系为主的分散状况将难以打破。只有进行纲领的讨论，以友谊为基础的时有时无的联系才可能为政治上的实质统一所取代。

1901 年伊始，即《火星报》创刊后的第一年伊始，《火星报》协助小组和代办员开始在彼得堡、莫斯科、普斯科夫、波尔塔瓦、萨马拉、南俄各地开展工作。这个时候《火星报》的出刊频率很低，大概两月才能出版一期，向俄国国内通过走私运送也遇到各种一言难尽的困难。列宁在安排好报纸印刷等具体工作后，在 4、5 月间开始起草纲领初稿。仅在《火星报》的六人编辑部内，在纲领上取得最初步的一致已经是 1902 年的 3 月。从列宁开始起草纲领初稿开始算起，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他们毕竟向 1903 年的代表大会提供了一个纲领草案。这些将历史必然性人格化了的英雄们，或许在那时并没有预料到有生之年会见证工人阶级辉煌的胜利。他们那时毫不犹豫地沿着列宁道路奋勇前行的精神，却给了我们今天这些面对同样难以预料的未来的探索者，去沿着相似道路毅然奋进的信心。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像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 1949 年的新年献词中所宣称地那样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72 页）

纪念十月革命 104 周年

104 年前的俄历 1917 年 10 月 25 日，公历是 11 月 7 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104 年后的现在，即公历 2021 年的 10 月，我们中国的革命者要纪念它，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而且是因为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在名义上是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专制资本主义的中国，我们需要新的十月革命，需要推翻复辟了的资本主义，重新建立社会主义。

人不是靠放下筷子前的最后一口饭吃饱的。类似的，十月革命也不是靠最后那几天的英勇斗争就胜利的。如果从列宁的哥哥被沙皇杀害、列宁本人被喀山大学开除的 1887 年开始算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准备了 30 年时间。如果从列宁结束流放，开始流亡海外创办《火星报》的 1900 年开始算起，那也有 17 年的时间。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30 年中和在 17 年中都做成了什么。1991 年，是即将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彻底复辟雇佣劳动制度的头一年。而到了 2004 年，明确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需要新一轮革命的觉悟者已经很不少了。可是到了 2021 年的今天，不要说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了，就连一份像样的政治报，都还没有办起来。已经有两代中国工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进行了 30 年的自发斗争，却始终没有等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要认真地纪念十月革命，就要看一看列宁他们为十月革命做了哪些环环相扣的准备，这些准备对于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哪些启示。如果只是口头上高喊纪念十月革命，甚至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流下热泪，却不去做那些为了新的十月革命而必须完成的工作，就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辜负了自己对工人阶级所负有的历史责任。

十月革命最突出的地方，是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坚决地用暴力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逮捕资产阶级政府的成员，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即以人民委员会的形式出现的工人政府。

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在力量上超过阶级敌人，以无产阶级中出现一个觉悟阶层自觉响应党的号召为条件。十月革命时俄国工人阶级中觉悟且有组织的阶层的人数，大概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之间。启发和组织这个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是革命主要的准备工作。可以设想，由于中国人口的规模、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和反动政府的力量，都较沙俄大和高，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人数，应该需要比十月革命更多。为了进行这个准备工作，就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而把资本主义意识的灌输从工人的生活中逐渐排挤出去。这就需要工人阶级政党，这个党有自己的纲领，有用对社会生活中各种事实的分析去阐释这个纲领的报刊，有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员去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促进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先进阶层的形成和组织。这个工人阶级政党，需要在已经存在的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内部各种冒险主义和修正主义开展斗争而诞生出来。2004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小组。17年来，有办报刊的尝试，有建党的尝试，有以组织方式开展对工人的宣传鼓动的尝试，但这些尝试带有摸索的性质，并没有系统地吸收十月革命道路的经验，当然更谈不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了。

十月革命向前回溯17年，是1900年。列宁所面对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的很像。有1898年建党的尝试，主要领导成员在党成立后立即被捕，并没有能够开展对工人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各地都在出版只能维持一两期的报纸，全国加起来一年只有几十号，毫无连续性和稳定性可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开展工人工作，开展工人工作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本人则在从17岁到30岁的13年中一直处于沙皇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列宁用“手工业方式”来刻画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状况，即缺乏自觉性，各自为战，不是作为一个有计划的组织的一部分来工作，而是自发工作形成了全国各小组各自缺乏持续性，互相没有联系的状况。这样的局面自

然造成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改良主义成了沙皇政府在左翼阵营中事实上的帮手。

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步骤，首先是通过自由的、不受审查的、在海外出版的秘密报刊来结束这种一盘散沙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态。秘密报刊批判只搞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意识灌输的改良主义思潮（当时是经济主义），说明无论是推翻专制政府，还是在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后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都需要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意识的全面灌输，为此必须建立起一个集中制的党来。列宁特别强调，为了保持刊物和运动的连续性，在专制制度下必须有一个海外基地——在建党之前是海外的报刊编辑部，在建党之后是海外中央。《火星报》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在遇到无数发行困难的情况下，还是迅速战胜了改良主义思潮，统一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为各地方委员会，并建立了这些委员会与海外编辑部和国内当地工人之间的联系，为党事实上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这是列宁在历史上曾经做到、而我们在当代始终没有做到的一步，但却是通向新的十月革命事实上的起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后面还与建立松散的党的尝试、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尝试、革命失败后取消秘密党的尝试、用“保卫祖国”的口号腐蚀工人革命意识的尝试、在革命的前夜与资产阶级妥协而最终葬送革命的尝试继续进行了 14 年的斗争。但不管怎样，这一切的基础，即布尔什维克这个政治思潮和派别，是在 1900 年至 1903 年《火星报》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不出版《火星报》，不进行与改良主义思潮的斗争，不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融合为统一的委员会和统一的党，不推动这些委员会走向工人阶级并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分化出来，所有这些后续的步骤就都无从谈起。

我们纪念十月革命，就是要继续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用暴力革命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具体来讲，在目前这个阶段，就是要设法定期出版由全国各

主要马克思主义小组共同参与的秘密刊物，并在这个过程中融合形成思想上反对改良主义、政治上坚决为创造工人阶级先进阶层而斗争、组织上民主集中的统一政党。特色专制政府会运用它全部的国家力量来破坏这个过程，自由派会发挥它全部的智慧来嘲笑和抹黑这种努力，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穷尽它全部的伎俩来从内部阻碍这一趋势。不付出巨大的牺牲，不进行彻底的斗争，不克服巨大的困难，不要说再过去 17 年，就是再过去 30 年，新的十月革命也不会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由于它内在的矛盾，十年左右就会遭遇一次大危机。只要我们敢于向前迈出这一步，十月革命的道路就会在我们的面前铺开。我们一定能沿着列宁的足迹，在特色资本主义的中国条件下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创造出来，在赵家人最虚弱的时候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不应支持特色政府的对台主张

读者来稿

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台湾问题，必须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放在首位。特色黑帮鼓吹统一台湾，政府的宣传喉舌致力于向群众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用民族复兴的话语来代替阶级分析的话语，意在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掩盖国内的阶级矛盾。所以，如果支持特色政府的对台主张，就是在为大陆统治阶级的稳固统治服务。

有观点认为，收复台湾可以保卫大陆无产阶级免受美帝国主义的侵扰。这种观点没有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置于首位，为了美帝国主义可能的侵扰，放弃了教育群众摆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的首要任务。尤其是现在统治阶级常常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装点自己的反动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说收复台湾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恰恰跟统治阶级的手法不谋而合。还有观点认为，收复台湾可以促进两岸无产阶级的团结。这种观点更是经不起推敲。无产阶级的团结并非建立在被同一个反动政府统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阶级意识基础上。以民族国家意识来代替阶级意识，恰恰会使两岸无产阶级产生隔阂，而有利于两岸资产阶级用统分问题掩盖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现在两岸无产阶级的隔阂，不正是由于两岸资产阶级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吗？总之，如果支持特色政府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统一台湾的主张，就是在为大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同时还会破坏两岸无产阶级的团结。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继承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承认台湾人民有通过自决来解决统分问题的权利，尤其是承认台湾的无产阶级有此种权利。列宁在《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中写道：“要求承认每个民族具有自决权，这件事本身仅仅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人民自决的企图……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而是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列宁全集》第二版第7卷89-90页）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承认“公民的自由的民主的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7卷90页）不仅仅因为相对于压制群众民主权利的专制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进步的内容，更因为这可以促使无产阶级享有更好的政治斗争条件，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而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彻底的部分，无产阶级政党则负有揭露的义务。此外，无产阶级内部的平等更是其联合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要承认台湾无产阶级同世界上的任何无产阶级一样，都有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平等权利。

但同列宁一样，反对特色政府的对台主张、承认台湾无产阶级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绝不意味着**我们的任务是要主动**推动台湾的分离。列宁曾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的“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作了如下解释：

“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或者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列宁全集》第二版第7卷218页）波兰社会民主党认为这样的解释使民族自决权变成了模糊不清的空话。列宁反驳道：“难道承认民族自决权就得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任何要求吗？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承认一切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组织任何新的社团，丝毫不妨碍我们发表意见、进行鼓动，反对不适宜的和不明智的组织某种新的社团的想法。”（《列宁全集》第二版第7卷219页）

因此我们承认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利，并非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他们自决的任何要求，并非主动帮助台湾分离，我们支持的是台湾人民反对大陆专制政府沙文主义的自由的斗争，我们追求的是使台湾和大陆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

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于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正是无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区别之所在。帮助台湾分离，仍然是将民族国家问题置于阶级问题之前。统一还是分离，并不是两岸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关键。同受资本主义各方面奴役的两岸人民，只有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实现解放。而为了更有利地反对勾心斗角但在阶级利益前又相互勾结的两岸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争取两岸无产阶级打破隔绝状态，在无产阶级共同的阶级自觉基础上联合起来，到那一天大陆和台湾自然会实现阶级团结之上自觉自愿的统一。这种统一与特色政府主张的统一具有质的差别。

三个历史决议的三种历史意义

2021年11月11日，俗称“双十一”，是为了克服生产过剩危机而制造的购物节。在这一天，特色党通过了所谓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相应公报由新华社股份有限公司受权发布。虽然是巧合，但在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购物节这一天，由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有关自己历史决议的公报，不知道号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党，有没有感觉到一丝黑色幽默的意味。几天之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全文也发布了。这个名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文件，和1981年由“总设计师”主导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资产阶级政治代言人对待历史的看法。它们和1945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形式上是由同一党所通过，看起来甚至语句上也有少许连续性，但却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具有三种迥异的历史意义。

一、第三个历史决议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向独裁专制政治形态的转化

历史决议得以通过，标志着路线和派别斗争达到了里程碑式的结果。历史决议的主要作用，是统一思想。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通过，说明黑帮党内主张独裁专制的派别，战胜了主张开明专制的派别，并要求黑帮党不完全赞成独裁专制的派别统一思想于独裁专制的道路上来。这一点第三个历史决议并不隐晦，明确地讲确立自己党魁在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其思想的指导地位，对自己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所谓“两个维护”，是理解第三个历史决议真实历史意义的关键所在。

第三个历史决议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向独裁专制政治形态转化的必要性。比如说把党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样四个时期，暗示新时期应有新的政治形态。再比如说在决议第四个部分介绍新时代发生的十三个方面的成就和变革时，说明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问题和新党魁的业

绩，暗示为了继续这些成就和变革就必须转向独裁。但这只是部分暗示了向独裁专制政治形态转化的原因，真实的阶级原因则是无法在公开文件中说到的。暗示的原因是：特色党领导集团的多数意识到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开明专制政治形态，由于形势变化，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真实的阶级原因则在于：无产阶级尚未觉悟和组织起来，不能够迫使专制政府做出重要的妥协和让步；小资产阶级虽然日益破产，但仍处于大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超过了推翻专制政府的需要，选择了与专制政府妥协；代表高级官吏、国有垄断资本和大私人资本、大地产富豪的专制政府，为了掩盖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最终选择了法西斯道路。从开明专制退回独裁专制，说明是专制政府按照自己的面貌和需要改造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而不是自由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面貌和需要改造了专制政府。自由派资产阶级再次表明自己无力进行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再次表明自己由于畏惧激烈斗争必然躲进法西斯主义的羽翼之下。由于除官僚资产阶级外其它主要阶级无组织，国家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而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不在法西斯专制下以最大的勇气和牺牲进行本阶级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就不能创造争取民主的社会力量，就不能走出这黑暗的历史阶段。

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对比和总体策略变化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状况中。国内市场的充分利用和国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在 2008 年以后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原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残余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提供了逐步拓展的国内市场，新的世纪则用房地产、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市场化将国内市场扩张到了极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在 2008 年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之后，特色继续依靠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扩张，以寅吃卯粮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这一切在 2012 年以后都日渐表现出不可持续的迹象。所谓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质就在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危机阶

段，就在于过去用尽所有办法维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这个过程中诞生出来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却不可能一去不复返。垄断和危机意味着反民主，这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的原理。特色黑帮和特色自由派的选择，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的普遍意义。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内资产阶级选择了特色复辟道路

毛泽东同志去世后，中央委员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占有多数，党内资产阶级及其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政权。要复辟资本主义，只能通过非法的军事政变。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陈云，一开始主张用合法的中央全会方式实现政权转移。据说他在研究了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之后，只得放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走了反革命政变的道路。而动摇于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之间、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在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配合了资产阶级的军事政变。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路线和纲领，不能持久地掌握政权，很快就被资产阶级取而代之。在 1978 年完全取得政权之后，是走后来苏东剧变那样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走中国特色的复辟道路，资产阶级内部有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主张走剧变道路的资产阶级派别要求完全否定毛泽东，主张走中国特色复辟道路的人主张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毛泽东。第二个历史决议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出台的。

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被走资派称赞为“总设计师”。这是完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似乎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没有诸多条件的约束，只要设计好就可以了。实际上，邓小平之所以是老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原因在于他能够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果断地选择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策略。苏联党内资产阶级选择剧变的道路，是因为要求保留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较少。“八一九”政变得不到党内多数支持，即

是客观的证明。中国党内情况则不同：建国时间不长，参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内领导人许多还未去世，群众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洗礼，有较高政治觉悟。如果这时选择以露骨的剧变方式复辟资本主义，党内外的反对力量可能会有极大反弹。与这种阶级结构相适应的复辟策略，只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名义复辟资本主义。为此，邓小平选择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毛泽东的特色复辟道路。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既有大量的篇幅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坚决地否定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忠实拥护者。中国、苏联等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从反面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思索和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座高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只有既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实践过之后，这一标准须要发展成，只有既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修正主义，那就是只坚持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却拒绝现实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改良派。他们客观上在无产阶级中弱化革命意识的灌输，用历史教育的任务冲淡了甚至掩盖了现实教育的任务。

这里需要简要地谈及为什么会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预言了资产阶级复辟可能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外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也可能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复辟主要危险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内部。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不会因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减少而削弱，而且会因为包括教师、医生、技术员、办事员等在内的非生产劳动者增多，以及他们确立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而加强。另一方面，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占据了党内大量高级职位之后，能够掌握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以及社会组

织过程中人财物的调配，他们在脱离劳动者的监督之后，就会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这些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不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力图击败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一危险，不可能通过完全将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来消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非生产劳动者在人口比例中的上升，小资产阶级不是日益没落，而是一股客观存在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资产阶级受到大资产阶级的排挤，具有相当的革命性。其政治代表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依据其理论外衣分为两派：一派是不采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表达其诉求的民粹派，另一派是满口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孟什维克。这是俄国革命中两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一般意义。那些满口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完全赞成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口头上赞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纲领，最终担任党内重要职务，形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这种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作为同路人共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为对手互相较量的关系，是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的普遍规律。

三、第一个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内无产阶级革命派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需要同时进行四个方面的斗争，才能最终胜利地进行民主革命。第一个方面的斗争，是战胜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路线。第二个方面的斗争，是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争夺对党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第三个方面，是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背叛民主革命的行径做斗争。第四个方面，是与专制政府做斗争。在现实中，这四个方面的斗争是同时进行的；在逻辑上，与党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路线的斗争是起点。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是先与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使党站到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再与“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使党成为群

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先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然后经历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其后又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才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个历史决议主要针对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路线，并将其根源归结为“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

（《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三卷，991页）。纠正第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将之上升为路线的高度，很不容易。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的军事路线，但多数党的高级干部认为这只是策略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后来毛泽东编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这本党书，对比了“左”倾路线与正确路线的代表性文件，才使得党内多数人认识到这是路线之争，是党内的无产阶级路线与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

第一个历史决议，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路线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路线，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旗帜下空前的统一了起来。有了这样的胜利，其它三个方面的斗争，即争取民主革命中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战胜自由派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和击败民主革命的对象，就都有了保障。1945年时党内多数人估计胜利还需要很长时间，实际上1949年就胜利了，原因主要就在这里。但这只是革命中的一步，而非全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路线和利益，仍将不断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里再生出来，因为这是社会经济层面无法消灭的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思想的反映。

第一个历史决议与后面两个历史决议还有科学和意识形态上重大的区别。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党内胜利派别对历史的看法，都是试图统一思想的产物。但因为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决议，因此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后面两个历史决议，虽然表现了资产阶级不同的政治需要，但都是在非科学的历史观下做出的。无论后两个决议自己如何标榜自己基于马克思主义，它们也无法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去

观察历史，因为一旦这样做，它们的政治目的就必然被完全揭露出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这个人。他既是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和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助手，同时也是邓小平炮制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助手。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就只赞成第二个历史决议，而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主要方法，即把党内斗争看作表现为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否定掉了。他主张斗争是认识斗争，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同导致的主张发展快一些和慢一些的斗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增定本第 690、691 页）他否定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看来事实上存在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的文化革命时代，恰恰表明其试图抹杀阶级斗争的倾向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胡乔木是第一个历史决议后空前统一的党的一分子，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那个他试图从思想方法到政治结论都加以否定的伟大领袖是多么的科学，多么的正确。

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我们有特别的指导意义，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站到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立场上来的第一批有组织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左”倾路线错误，遭遇了佳士抗争的失败。他们也是先在自己内部战胜了改良、拒绝组织等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才在走向群众的过程中陷入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仔细地清理这个过程的经验教训，是重新开始的出发点；而毛泽东制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于我们总结自己的历史，则是不可缺少的参考。

未来中国的革命，第一步的任务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主要目标将是推翻黑帮法西斯专政。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曾经走过的先反右、再反“左”的道路，必然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经历一次乃至数次。理解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历史意义，让我们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什么样的党内斗争胜利和全党的统一。理解第二个历史决议，让我们能够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在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后，仍然面临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支持下的更加激烈地反抗。理解第三个历史决议，则让我们充分认识我们在其中

斗争的历史条件的性质和我们斗争的初始目标何在：那就是建立一个既能战胜右倾机会主义，立志用革命阶级的暴力推翻法西斯专制，又能战胜“左”倾机会主义，能够走向群众并让自己的纲领得到群众拥护的党。当我们也能做出自己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我们距离对法西斯的胜利也就不远了。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毛头鹰

在革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认为自复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需要革命而不是改良，需要重建社会主义，这是初步的共识。但是对于如何具体达到社会主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其所依据的革命理论的直接来源是列宁主义。但是这一原理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进一步阐释，还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所谓“俄国化”，“中国化”？有的同志认为，当代中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存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划分；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没有革命动力，即使需要民主革命，也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认为，以上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依然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完成得如何，将直接影响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能否顺利实现。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理由，是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都生活在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年代。德国的军事专制制度，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以及中国的国民党专制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俄国，有农奴制的残余，在中国，有半封建

的土地所有制。但是当代中国的情况不同，它的资本主义直接来源于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失败，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彼时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因此中国不存在封建制度的残余，资产阶级没有历史上那个革命的对象。当前的专制制度正是官僚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统治工具。无产阶级推翻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建立新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怎么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这是缘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理解上的偏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这个革命是否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是否有动力参加，是专门反对“封建”专制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专制以达到政治自由。这些是具体的历史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民主程度也各不相同的国家内会有极其多样的形式和路径。它的本质在于，民主革命是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制度，也就是民主革命的要求在理论上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矛盾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从而也就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专制的一般特点是官吏和警察专权，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没有民主监督。反对专制制度，是因为只有消灭专制制度，获得政治自由（当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才能使资本主义更充分更快速地发展，才能使广大居民从不开化状态中解脱出来，为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提供广阔的空间，才能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致因为专制制度的存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是走向公开的自由的大道，从而有条件争取社会主义。“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70页）

民主革命虽然在理论上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现实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彻底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能允许的一切民主条件，从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潜在可能性。“我根本不想否认存在着无数历史的和实际的条件（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这些条件正在并且必定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不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卷74页）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也存在着诸如种族歧视、性别压迫、警察滥杀无辜等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本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中小私人资本与掌握政权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而存在着美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华尔街政府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在不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得到解决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把共和国变成君主国。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必要性丝毫没有削弱。“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指社会主义的革命——笔者注）。 ”（《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11页）“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67-168页）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广大居民争取一般民主，即“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11页）在当代中国，除了自由派的斗争，还存在着诸如性别平权运动，反对官僚封校、要求扩大学生权利的学生运动，少数民族维护其文化传统、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用暴力剥夺其学习本民族语言的运动等一般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及其政

党不应该对民主主义斗争视而不见，因为在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只有在群众斗争的高潮到来时号召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用革命的手段实现上述诉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才不致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政治自由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才不致将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困难。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即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有着民主诉求，但是随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全方位打压，自由派运动日渐式微，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革命的动力，与官僚资产阶级共享专制制度保证的“稳定”。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去革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从而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即使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称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首先，没有理由认为自由派运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仅仅以随着专制政府的镇压，尤其是 2018 年以来，我们看不到公开的自由派运动为依据，那么从自由派的视角出发，同样可以说，随着专制政府的镇压，左翼运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秘密状态的小组大量存在，电报上的反政府刊物层出不穷，境外一些自由派媒体一刻也没有停止号召中国人民打倒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在反革命的时代，革命者被迫流亡海外或者保持秘密状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只不过表明反动派的力量暂时还很强大，人民的组织性与战斗力量还很弱小。

其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动力大小，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必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

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9-440页）没有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革命便有其必要性。当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的革命力量，其本性总是倾向于妥协与背叛，往往不希望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即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宁可让它流产，以改良的形式收割人民的斗争果实。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什么行动，无产阶级都会充当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资产阶级愿意革命，我们就热烈欢迎；资产阶级动摇妥协，我们就揭露其行径，促使它革命，像监视敌人一样监视这个暂时的同盟者。但无论如何，这个革命的性质归根到底是不超出一般民主范畴的，从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还要指出，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是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工人，资本家。但是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在小生产数量占优势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待阶级分化和已经开始阶级分化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会有所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条件脱离直接生产过程去从事非生产劳动，而受到大资产阶级排挤的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的政治代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小资产阶级具体由哪些阶层组成，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5-436页）如果可以用一般性的原则来概括与区分两种革命，那就是：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

性。”（《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 11 卷 63 页）因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说法是不严谨的，会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界限。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三个理由，是认为提出民主革命的口号会模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在群众看来，这与自由派的口号相同。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得现在依然保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要比当年多得多，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会吸引这些“先进”群众，减轻革命的阻力。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只有政治文盲才会混淆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与无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会旗帜鲜明地阐明其民主革命的内容与实质。因为群众的政治理解力不够，无法区分各派色彩，就拒绝提出民主革命口号，实际上等同于放弃对工人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的觉悟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始终必要的任务。至于所谓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很多，难道是在说黑帮专制政府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欺骗工作白做了吗？中国左翼群体的思想之混乱有目共睹，其中不乏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回归社会主义的，不乏以超阶级的视角看待国家，拥护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只反对资本家不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历史早已成为自复辟以来罪恶统治的遮羞布，不彻底打碎特色的假社会主义招牌，粉碎群众头脑中的自动回归社会主义的幻想，就不能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群众头脑。其次，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无产阶级不争得政治自由就无法使阶级斗争充分展开，就谈不到走向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普遍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自由等民主权利的条件下，要求无产阶级跳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民主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无非是在人民革命运动高涨，普遍要求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的时候，要求无产阶级抛开可能的同盟者，独自夺取政权，忽视与小资产阶级一同建立革命民主专政的可能，忽视全体居民争取实现管理国家事务的一般民主，忽视无产阶级在争取

民主的斗争中可以受到的教育，跳过这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去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反动派对革命力量内部的分化与矛盾是喜闻乐见的。同盟者之间的内部斗争会极大削弱革命力量，从而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或者资产阶级窃取革命果实，与反动派分享政权。无产阶级期望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却使资产阶级赢得了它们所希望的民主“革命”。比起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失败导致的革命流产，这种流产方式更加令人惋惜。推翻专制政府不必然等同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权，更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有着较广泛经济基础从而较广泛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派别，在推翻专制政府的高涨时期不可能不通过进行派别活动和组建政党的方式参与，以便革命成功后能够建立符合其利益的政权。不论革命成功后是否共同组建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都必须牢牢把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将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将列宁主义看成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将民主革命的理论看成特定历史和国别条件下的特殊情况，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宣传。共性只能通过个性表现出来，马克思用英国作为例子和材料来源阐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列宁用俄国作为例子阐明被马克思所发现但并未系统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注重逻辑过程而不是注重结论地精读《列宁全集》，才能系统清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对诸如民主革命的一般理论获得科学的理解。

论我国革命

读者来稿

我认为列宁道路将我国革命现阶段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相当准确的。在接下来，我想具体讨论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一般策略。

首先，我认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同于诸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列宁道路所说“自由派资产阶级无力进行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再次表明自己由于畏惧激烈斗争躲在法西斯主义的羽翼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大于革命性，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担。

其次，我将区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政府，建立革命民主政府。由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力量的不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左中右三种结果。第一种是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政府。第二种是出现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第三种可能是政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手中。这三种可能最后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第一种可能之下由于政权已经被无产阶级掌握，因此可以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后两种可能之下，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会给无产阶级政党创造出进行大规模组织和鼓动的机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前提条件。最终将通过一次新的“十月革命”来完成这一过程。

我国在当下只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革命的性质和目标不同决定了革命采取的策略不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该领导和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绝不放弃对工人阶级进行充分政治教育的任务，以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迅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发。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最常犯的是“左”和右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右的，例如历史上王明所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但同时应该保证自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证自己相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保证自己具有充分对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鼓动的自由。

第二种策略是“左”的，即毛泽东所说的“关门主义”。这种观点反对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随着经济危机加深，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进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充满怨恨，但又苦于找不到革命的道路。正如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许志永在法庭上所说：“如果我的改良主义主张不被接受，那么中国未来将会出现革命”（大意如此）。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时期，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突出体现在对历史上文革的妖魔化和恐惧）会采取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突出表现是 2000-2012 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广受欢迎。

但是，当特色政权加速法西斯化，改良主义的空间被扼杀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会转向革命立场。香港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勇武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理非）即在 2014 年改良主义的“占领中环”失败之后，急剧激进化，采纳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进行了从 2019 年至 2020 年失败的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处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领导之下，而不是反过来，而这又是缘于香港独特的国际位置和阶级结构。因此，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它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无力完成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在当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既具有深刻的革命性，也具有深刻的动摇性。革命性如前文所示，动摇性体现在当大规模革命运动爆发之后（例如1905年俄国革命），专制政府为拯救其统治，必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改良措施。例如召开国家杜马，和人民“分权”，同时坚决镇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大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跑步进入杜马，进入专制政府，放弃民主革命任务。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给先锋队带来了新的理论和认识，壮大了先锋队的力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机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既不应该拒绝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先锋队（当然，要视其觉悟程度而定），也不应该放弃在党内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展开路线斗争。

论我国革命（二）

读者来稿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头所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由于列宁道路之前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当下的革命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一革命阶段，主要目标是推翻黑帮法西斯专政，资产阶级自由派并非革命的主要敌人。我们之所以提出我国当前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便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我国左派当中流行了很多年错误的路线，也就是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而共同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派。这一错误路线所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绝对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灾难。我们认为，尽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满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每天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似乎跟中国左派共享了同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但却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用列宁的话说，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集中，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势必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本国的垄断资本想要继续壮大，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保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这使得海外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必然。

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国家需要转变角色和组织方式，使自身能够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自由放任式国家」向「积极干预式国家」转型，对于中国来说，突出特点是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开明官僚向独裁官僚转移。

这种转变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阶级斗争：大型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是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抵抗，才能成功转变国家形态，从政治上加速中等资本家的灭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背后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型」的大背景，也体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般趋势和内在矛盾。正在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一冲突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就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两个层面严重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垄断资本成为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第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将对于工人阶

级的剥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上、废除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权益，突出体现是现在被提升到政治高度的所谓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和对一切工人运动的严厉打击。第二，垄断资本的扩张势必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用工人阶级的鲜血和生命来为垄断资本争夺原材料、市场和投资机会。因此，垄断资本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胜利，绝不是什么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灾难。

至于有同志认为的承认我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会使革命黯然失色，失去意义，吸引不了工人阶级，我引用列宁在《专制制度与无产阶级》一文中的论述就可以反驳：

工人阶级抱有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种各样的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顽强的努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而灰心。对这样真正的革命阶级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摆脱一切自我欺骗、一切幻影和错觉更重要的了。在我们俄国，最流行和最常见的错觉之一，就是似乎我国的自由派运动不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似乎俄国所面临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最温和的解放派[73]一直到最极端的社会革命党人——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俄国觉悟的无产者却认为，这种承认是对实际情况的唯一正确的阶级分析。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之高阁，决不等于提前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那些回避所谓片面的阶级观点的人，那些想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又害怕直截了当地把我们俄国所面临的和在我们俄国已经开始的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会陷入大失所望和来回摇摆的境地。

不知这些同志看到列宁的回复有何感想呢。承认我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会使我们丧失对于抱有消灭世界范围内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伟大目的的工人阶级的吸引力。恰恰相反，我们将会获得这种吸引

力。这只会使我们失去对一些整日希望能“最快速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吸引力。这些小资产阶级曾经寄希望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某一天“突然左转”，“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在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之后从「一次改良」演变为「一次革命」，幻想只通过一次「迅速的革命」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获得上升空间，至少坐稳中产阶级的位置。哪怕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也在所不惜。因此，同样一批小资产阶级也很有可能被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只要一次革命就可以解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哦）所吸引，完成一个从“极左”向极右的华丽转身。我相信，失去对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吸引力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一件坏事情。

“一次革命论”的突出体现就是拒绝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而拒绝进行严肃科学的阶级分析正是法西斯主义“革命”的突出特点。法西斯主义“革命”开始就是一场小资产阶级运动，小资产阶级由于其在阶级结构和社会生产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沉迷于各种抽象的关于“人民”、“民族”、“社会主义”和“反资本”的口号中，而无法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理性科学的认识，也无法对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进行准确认识。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大批走向破产，他们迅速地转向“革命”立场是好不稀奇的。问题的关键是，这里的“革命”到底是哪种革命？

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加以认真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将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团结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左翼，共同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我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取得胜利！在此，我希望请赞同“一次革命论”的同志回答以下问题：1、“一次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哪个？2、“一次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3、“一次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朋友？

至于有同志提到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事实。我认为，这一事实只能说明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了。这一事实绝不能推导出我们应该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地方，也存在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我国香港的人均 gdp 就远远高于内地，但还是爆发了 2019-2020 年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中的特点和我们应该对其采取的策略。首先，我认为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其政治代表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毛泽东在文中所讨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具有相似性。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首先，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具有相当明确的纲领和目标的政治集团，其主要阶级基础是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既与小资产阶级相区别，也与垄断资产阶级相区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纲领是建立类似于美国这样进行全民普遍选举和采取宪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他们经常所说的“正常国

家”。在这样的“正常国家”里，中等资产阶级可以免受官僚专制权力的侵害，也不会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所以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家”。

在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以马云为代表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并不支持所谓“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因此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相区别。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区分是，中等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官僚作为“靠山”，作为其完成垄断的暴力保证，因而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取市场一般利润率，而不能像垄断资本一样获得超额利润率。同时中等资产阶级也时时面临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其进行兼并的风险。由此，产生了中等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这种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官僚专断”和“党”的痛恨。

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上文所说的其受到垄断资本的侵害，尤其是当正在崛起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建立全面领导权的时候，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原来奉行不移的改良主义立场在弱化，其先进人物往往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中等资产阶级自身并不掌握国家暴力，其往往依赖于官僚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暴力来镇压发生在自己企业中的工人运动，因此其又表现出保守性或者说反动性。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逐渐尖锐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等资产阶级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分化过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左翼将会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中间派将会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右翼则将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背叛革命，成为垄断资本阵营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仍然面临被垄断资本所压迫的境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完

全可能争取到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的。这种支持是确保民主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由于我国实际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处于半边缘的位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史尤其是从 08 年至今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我国无法像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建立“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资产阶级自由派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政治目标将始终是一种幻想。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等国的情况来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残酷的相互竞争，我国无法建立长期稳固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只能要么倒退回现在的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状态，要么继续前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型政权，最终消灭国家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发展（以中特为例）

读者来稿

序言：谈谈研究的方法

“一次”或“二次”革命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当下中国的革命是否需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具体革命实践中，我们必须面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必须面对中小私营资本家对官僚特权的不满，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于高昂房价的愤恨。

因此，“一次”或“二次”革命直接联系到革命的目标、纲领和路线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问题。

首先，我们都承认我们当下社会的性质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每个人都是停留在自己的主观认知方面。还没有人，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总过程做一详细的论述（类似于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认识我们当下中国的所处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大家都是凭借自己的感知而达成了共识的。当然这样的主观感受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力图成为革命者的人而言，必须要对资本主义发展与阶级斗争的过程做一科学的描述，才能达到毛主席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主观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

因此，笔者的这几篇文章，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力求严谨地讨论所谓“一次”或“二次”革命及其实现的条件，为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子问题需要被讨论清楚：

1. 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2. 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在此基础上，可以讨论的问题
3. “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以及
 4. 要不要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左翼结成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我希望可以促成有逻辑的、科学的思考与讨论。最后，即使包括笔者自己在内也由于现实材料掌握的不够、理论的不彻底，使得这几篇文章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笔者自己指出的问题，也希望读者可以多多提意见和批评。

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能否充分发展？

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最充分的发展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在政治上**，要求所有公民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意味着工人作为国家的公民也同资本家一道，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游行示威等一切公民都所平等地拥有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人的工资不被人多地压低，从而保证工人对于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购买力。同时意味着除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之外，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性别之间、不同种族/民族之间、城市人与农村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些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歧视和压迫，都应当作为封建的遗毒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些要求本身没有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能允许的极限。**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生而平等！**）

我们的资产阶级在他还是一个革命阶级的年纪曾郑重地向世人宣告着生而为人享有的平等的权利。

这些言论与主张，早已被我们当今资产阶级这帮行尸走肉们忘得一干二净，顶多只在自己的宪法中或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他们的什么美梦中充分实现过。**稍微踏出这个空中花园一步，资产阶级就会立刻感受到，给予无产阶级以平等的权利是如此的危险，一旦无产阶级拥有这样的权利，这把锋利的武器也立马会指向了资产阶级本身，以至于可以将整个资本主义埋葬。**

然而，不给予无产阶级这样的权利，必然意味着在社会上保留一些人的特权（最典型的**就是官僚特权**），特权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必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当然，我们的资产阶级未必真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会有助于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斗争与解放，而在这样的发展中，资产阶级会被无产阶级所埋葬。

(2)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要求对劳动的一视同仁，要求资本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无限扩张，要求消除私人继承制而将资本集中于最能赚取剩余价值的人手中，要求打破城乡的二元对立，要求破除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消除性别分工和所有种族歧视，这是资本所能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改变所有旧式的生产方式的最激进的要求。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对这十条措施，没有一条超出了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极限。因此这些做法是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是，出于对这些措施背后隐含着的“激进的对私有制的否定”的恐惧，资产阶级往往不愿意实行这十条措施。只有当面对经济危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威胁下，才会从这十条中选出几条来实施。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然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消除土地所有权**，意味着土地所有者不能凭借自己对土地的占有而占有剩余劳动，这立刻就可以得出凭借对机器、厂房、工具、原材料等的占有不过是对土地的占有是一样的性质，只是占有了不同的生产资料而已，对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很轻易就会转化为对一切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否定；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消除劳动力的一切差别即彻底性别的解放**，可是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平等立刻就意味着女性不再为家庭的再生产、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提供无偿的家务劳动；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破除城乡二元对立**，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彻彻底底地进行乡村，使得农民工具有和城市中产阶级一样的购买力。可是乡村旧的生产模式下极其低廉的完成劳动力生产条件不正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么？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将资本的关系渗透到一切地域和领域**，可是资本总是一窝蜂地涌向利润最高的产业领域和地区，留给其它领域的和地区的，则是旧的封建关系的延续与复活（比如东北）。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悖论一般的事实——即资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永远”无法使得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客观情况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专政下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历史上看，哪怕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其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或多或少地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因此也就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需要留一段时间来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这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秩序的重新巩固），而是应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是绝对的。

（二）中国的现实恰恰印证了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展这一普遍原理

1、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既然是作为现实的行动的纲领，那么毋庸置疑，纲领就必然包括对现实的分析，而并不仅仅是就抽象的过程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必须要向所有看到我们纲领的人们证明——我们所论述的革命道理不是泛泛地空谈，不是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而是切切实实符合当下的条件的行动指南。我们谈论现实的条件，不是为了搞出什么中国特殊论，而恰恰是向人们揭露：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而正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历史规律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法解释的情况，而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这一发展的全过程，并指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

一般性的过程蕴含在事物的具体过程之中，将具体的过程描述清楚之时，也正是其一般性得到彰显之时。科学的一般的道理有其适用的条件，只有将这一条件摆明，才能证明科学的适用性。

同时，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社会科学没有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实验室，它所研究的任何实际过程都是矛盾多元决定的；在多对矛盾之中，只有将实际的过程展现出来，才能显示出我们所谈论的问题正是主要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正是科学所描绘的这一过程而不是那一过程才是事物发展的主要进程。

具体到我们的研究，就必须阐述明白：中国的发展正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当然这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因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遵循/应当遵循一般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同样，只有阐明了中国当下“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出“一次”或者“二次”革命的观点。

我们看列宁同志的早期文章，就会发现在 1-4 卷中大量的出现列宁早年对俄国现实材料（尤其是经济材料）的研究，并且正是凭借这些对现实材料的研究，去反驳民粹派的观点。

2. 2001-2008 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我目前只能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做一笼统的描述，更为具体的阐释，我希望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其补上。

如果说邓的时代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确立的年代，江的时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确立的年代，胡温的时代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对外贸易的马车大幅前进的年代，那么习的年代，则是这一体制遭遇巨大困境的年代。

2001-2008 年，也就是中国加入 WTO 的前 8 年，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模式在 80-90 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而到了新世纪的头几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真正确立。

如果说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作为一种外部冲击阻断了这一增长的“迅猛”态势，那么这一所谓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早已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之中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同世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具有深刻的不平衡性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对立

资本在城市的集中意味着新一轮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而同时与之相并存的是外来务工者虽然工作在城市，然而因为户口和房价的限制（隐藏在房价背后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房地产行业超额利润的攫取，户口则是官

僚掌握的一种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的方式。例如在北京，公务员相比于私营企业的员工获得户口的机率要大得多），打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乡村承担：乡村低廉的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工伤致残工人的成本等，使得资产阶级得以利用这个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来压低劳动力的价值。

然而，这样做给资本带来的后果便是——资本主义在乡村迟滞而又萎缩的发展形态，农民工极低的消费水平，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难以被彻底开拓。

同时，农村作为粮食与经济作物的产地，在同城市的交换之中，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种“不等价交换”之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压低劳动力的价值，都必须对农业进行补贴，然而这一补贴在我国只是落入了农资提供商的腰包，我们的农民除了必须接受极低的粮食价格之外，无法享受任何补贴。

而我们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不愿触动任何的土地所有制（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另一方面，又非常乐意看到劳动力在极低的成本下的再生产；毕竟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国内市场的狭窄并不十分妨碍资本家在海外的商品销售。

(2) 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某位总设计师曾经提出过“两个大局”：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而到了将来，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然而，我们几十年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发展（2008 年以前），摆在人们面前的就只是资本在东部地区的集中和发展，而且东部的资本和人口越集中，就越有更多的资本和人口流向东部地区；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资本的外流与人口的外流。

如此模式下，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并不充分的国内市场；而留给东部地区的也并不都是甜果子——生产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带来的是对土地、原材料、粮食等资源的巨大需求，超过本地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的部分则只能由外地以更高的成本提供；同时，人口的集中和工厂大规模用地都带来的是土地资源的紧缺，地租则一路上涨——这一不断扩大的人口与生产的集中对资本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劳动力价值的快速上涨，工人在拿着极低工资的同时却需要面临快速上涨的房租和餐饮费用，阶级的矛盾被迅速激化。

然而，资本能够在一地聚集起初便是因为这里便利的市场、交通、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等条件，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则在不同程度上更加便利了这些条件。因此，资本在一个地区越集中就越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毫无疑问这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却绝不是最好的道路。因此尽管“大城市病”使得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都苦不堪言，这样的集中在自然的状态下也并无减少的趋势。

要想扭转这一局面，资产阶级只有依靠一种他们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想尽力避免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只有在国家暴力的干预下，资本才能将自己的触手伸向农村；只有在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西部大开发”才能初见成效；只有在“神圣的”国家暴力的庇护下，资产阶级才能“平安地”从海外攫取剩余价值；也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下，中国资产阶级才能与西方资产阶级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

以上只是谈论了在上述“以东部沿海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模式下，社会矛盾的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性别对立、消费者购买力

不足、生态环境问题、垄断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官僚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这一发展的相当可观的现象。可以看到——隐藏在这些矛盾背后的，无非是阶级矛盾；然而，资本在最自发的条件下无法按其理想对所有的地区、所有的人口都雨露均沾，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充分发展，是以另一地方资本主义的萎缩发展为条件的；而我们立马就会看到，资本在一个地方榨尽了它所能榨取的一切，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资本不断地变换其投资场所与地点，使得世界上总有一各地方处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状态，而这不过是以其他的地方的萧条为代价的。而在这些萎缩发展或萧条的地区，则是旧有生产关系的延续与复活（我国的东北可能是最好的例证）。

这里我们也可以在部分上回答我们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在中特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到底能否继续发展？

目前的答案：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将在重重矛盾中继续发展，在不断克服旧的矛盾中遭遇新的矛盾，但始终无法实现充分发展。

得到了这一步的结论，我们几乎只需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我们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中特本身的统治能力了。

3.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与中特的应对

如果说，2008 年之前的资本主义是在不平衡与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发展的，但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也同时宣告了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的危机。

2008 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 2009 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

为了避免可能一触即发的国内经济危机，特色在温家宝的主持下紧急出台了著名的“四万亿计划”，用来拯救中国的经济（进而也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危局）。

可是正如前文所说，2001-2008 年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国内市场的不充分发展的状态，人民群众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使得过剩的产能必然不能被第 II 部类即生活资料的部类消化掉；即使是通常的第 I 部类的投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也难以保证获利。

中央原本希望，这样的“四万亿”可以用于投资落后地区以及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用以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但市场经济的不以人为意志的规律使得这四万亿最终还是流向了房市、金融、地方融资平台等等，新的市场只是在土地财政的带动下才得以形成。

后来，自习上台以来，中央政府开始日益明确地认识到：**不深挖国内市场，不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砍掉已经严重过剩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落后产能”，扶持可以赚取“超额利润”的“新兴产业”，中特这艘船将很快触礁而沉。**

因此，自 2012 年十八大以来，即使是在经济领域内也是各种动作层出不穷：交通、能源、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大批项目开始上马，通过对一般生产条件的建设（我愿称之为广义的第 I 部类），企图为国内市场的开拓打下基础（所谓“要致富，先修路”）；狠下心砍掉过剩企业或者高耗能企业，大幅扶持新兴产业；加大“扶贫”的力度，这次措施表面上看是在做福利，实则不过是将更多的农业人口卷进市场化的浪潮；加大海外扩张的力度，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同现在的霸主不得不展开数轮较量，近几年双方关系更是逐渐紧张。

习自称做这一改革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然而其实质我们不难推测，仍旧是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固有利益内打转转，因而，完全不能阻止资

本向少数高利润率的行业（比如金融、房地产）、地域（比如长三角）涌入。那么对于这一系列操作的必然结果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判断：垄断资产阶级无力“拯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危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和延续统治，垄断资产阶级最终的选择是法西斯主义。

《火星报》创刊的平安夜和苏联解体的圣诞节

公历 1900 年的 12 月 24 日，即那一年的平安夜，列宁为之准备数年的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在德国的莱比锡创刊，距今已经 121 年。出版一份报纸，这似乎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件小事。

1991 年的 12 月 25 日，即那一年的圣诞节，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式上也宣告了解体，距今正好 30 年。亡党亡国，这似乎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件大事。

很少有人去讨论那个预示了资产阶级许多年平安不再的平安夜，而那个标志着资产阶级胜利的圣诞节却是相对的热点。马克思主义者会把这两件事情看作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环节，既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又研究它们之间对于今日革命的不同意义，从而得到恰当的阶级斗争结论：《火星报》的创刊才是无产阶级的大事，苏联解体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换而已。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只靠俄历 1917 年 10 月 25 日那一天的英勇取得的，它实质的起点是《火星报》的创刊及其与修正主义的斗争。理解这一起点，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列宁发表在《火星报》创刊号上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同样，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 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它实质上被颠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并改变了斯大林主要方向正确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理解这一颠覆，最好的参考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的压轴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

训》。与修正主义斗争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验证了毛泽东明确加以表述的如下规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真诚的革命者必须严肃地看待路线斗争的意义，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是如此。

在革命前，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困难，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和残暴，更在于革命队伍中修正主义力量的存在。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的存在。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将在革命队伍内部产生出保存资本主义的改良力量。列宁对此总结的规律是，革命的起点总在于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争取到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这是第一个任务。而后再把引导群众接受先锋队的立场提到日程上来，这是第二个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十节，《列宁全集》第39卷第73页）。基于这个历史经验，列宁认为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四派共产主义者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看似遵循无产阶级立场的声音，那就是应该先建立工人小组，再谈办政治报和建党的事情。这就把列宁总结的这个规律颠倒了过来，把第二个任务当作了第一个任务。这种声音未能意识到在没有建立拥护原则立场的先锋队的情况下走向工人，多半只能去迎合工人中经济斗争的需要，而不能把工人斗争提升到阶级政治斗争的高度上来。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建立，建党时党员中只有一个工人，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工人阶级性质。这当然不是说这两个任务将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完成，毫无交集，而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必须以建立原则坚定的政治组织为主要任务，反对右倾、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发展”会是倾向性斗争的主旋律。当这个阶段过去后，原则坚定的政治组织建立起来了，对工人群众进行灌输的问题提到首位时，反对“左倾”才可能成为倾向性斗争的主题。

在革命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立即改变革命前的经济基础，因此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政治影响。特别是由于消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农、城乡、脑体四大差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只是这些差别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同时大体完成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任务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科教文卫等部门必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并利用群众的不觉悟和无组织来复辟资本主义。四大差别造成的特权阶层是革命后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党内走资派则是其政治代表。这和革命前存在着工人贵族的社会基础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其政治代表，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长为领袖，主要是在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是因为当时存在着共产国际，帮助完成了列宁所讲的第一个任务。而在建国后，毛泽东又把这时的党内斗争作为建国前党内斗争的沿续，把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这是符合列宁所说的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首先和主要的斗争，而与“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是补充的斗争的看法。当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也能让斗争惨败，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和中国上一轮革命的历史都告诉我们的了。

党内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火星报》的创刊标志着无产阶级路线自觉地开展对革命队伍中体现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沿着这条光辉道路，而且只有沿着这条光辉道路走下去，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才能胜利地教育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走向共产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的上台，标志着修正主义路线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苏联在形式上的解体只是修正主义路线转变为法西斯专政后几十年的历史结果罢了。中国也是如此。在1976年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至于中共是不是像苏共那样灭亡，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罢了。无产阶级必须为

这种形式转变做好准备，准备着从民主革命这一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毕竟这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转变。

认识到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 1976 年就已经被修正主义者消灭了，正如革命的苏联共产党在中苏论战前就已经开始被修正主义者消灭了一样，对于理解各个政治派别在苏联解体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关键意义。

特色黑帮对苏联解体的总结为巩固其专制统治服务。他们说苏联解体是由于计划经济不能发展生产力，是为了给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进行辩护。他们说苏联解体是因为党员没有信仰，是为了给他们向群众兜售中特修正主义和习近平的独裁思想进行辩护。他们说苏联搞历史虚无主义搞垮了自己，是为了给他们镇压异己、控制舆论进行辩护。实际上特色黑帮自己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如果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实质上亡于 1976 年，现在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真法西斯，就会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去捍卫，沦为了法西斯的帮凶。

自由派看待苏联解体，除了和特色黑帮一样攻击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外，不同于特色黑帮的是还攻击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自由派隐蔽地用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党内斗争解释成个人斗争，抹黑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让当代有革命倾向的人把自己想像成类似斯大林这样个人品质低劣的权谋者的牺牲品，从而脱离革命并否认建立集中制的政治组织的道路。毛泽东指出了斯大林的一些具体缺点，如否定苏联存在阶级斗争是思想方法上脱离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如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等等，同时肯定了斯大林在政治方向上的原则性。“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

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06页。）如果能了解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斗争经历，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自由派对他的否定完全站不住脚了。只有摆脱自由派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歪曲的影响，才能走上推翻特色黑帮的必由之路。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苏联解体问题上陷入了巨大的分裂之中。一方面，他们由衷地崇拜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在苏联解体前三十年就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分析，做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惊人准确的预测，而这一预测是那些用唯心方法攻击苏联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回到以《火星报》为起点的那条革命道路，以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理由去为特色黑帮开脱。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别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的任务，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我们仍然处于列宁所讲的、以反对左翼队伍中的修正主义和沙文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第一个阶段上。

工人革命派接受毛泽东同志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对苏联的分析，但绝不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怀着改良特色黑帮的幻想，从苏联解体的分析中只得出攻击自由派的结论。工人革命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圣诞节必将到来，而为之做好准备就必须回到那个通过原则坚定的政治报去预示暴风骤雨的平安夜。

中国舆论场的二元陷阱与缺席的革命左派：从“南京大屠杀争议言论”说起

读者来稿

近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某某在课堂上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相关言论，被学生拍摄视频上传至互联网，并且被网友进一步剪辑，引发了巨大

的舆论反响。正值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这一舆情很快引起官方重视，各大官方新媒体平台纷纷发文斥责这一“错误言论”，而震旦学院也迅速宣布开除该教师。此外，上传这一视频的学生被以自由派为主的声音视为“告密者”，尔后遭到一系列“网暴”，官媒更是顺势将其吹捧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吹哨人”。随着与官方叙事相悖的声音相继消失，就这一事件而言，民族主义的声音似乎在互联网上“大获全胜”。

作为一篇时评，本文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事件本身的梳理和评论，第二部分则结合但不限于这一事件来分析当前中国舆论场所表现出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运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则简要讨论马列主义革命左派在这种形势下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

一、关于事件本身的简要梳理

1、事件的第一阶段：关于宋某某观点的争论

就宋某某引发争议的观点，笔者从如下三方面先进行简要的概括和评价：

（1）在事实层面，她的论述中存在若干关键错误（比如 30 万数据只是一家之言而缺乏更多史料支持，可以通过身份证来统计），严肃地为自己的立论寻求证据是教师的基本要求，利用自身传道者的地位传播具有很大误导性的信息是不负责任的。但这并不能证成举报行为的合理性，我们将在下文探讨这一点。

（2）就南京大屠杀数据而言，她的主要意思是：自己完全认为南京大屠杀是反人类的，这一点不以死亡人数为转移；但由于中国学界做历史考证工作不严谨，导致没有拿出足够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国外否认南京大屠杀或缩小其规模的声音。也就是说，国内“盖棺定论”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在国际上并没有被广泛认可，而国内还没有很好地回应他们从资料来源和统计

口径方面提出的质疑，因而只能从“政治立场”层面予以谴责。这点侧面提醒我们：对于这类主题，官方主要的“说服”对象不在国际上而在国内。

（3）就其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她认为不应该永远去恨，而要铭记历史、反思战争如何产生。尽管她的“反思”大概仍然来自自由派的立场，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但在帝国主义时代，相比于官方和小粉红“合谋”炮制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而言，仍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自由派、民主派的回应：对于（1）忽视或承认，但由于（2）这并不能证成她抹黑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罪名，而是理性探讨，试图确定受害者姓名是从宏大叙事走向人道主义关怀的表现，而对于（3），主张反思战争的原因才能超越简单的民族仇恨和一元思想，是对人和历史的真正尊重。

需要指出，这类观点的持有者与宋某某本人大体上来自相近的社会集团，即主要来自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老一代自由派和新一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此采取了相似的立场，但仍然有一定分歧，这将在下文中分析。

官方媒体（以及某些“左派”评论）对于以上三点的回应是：针对（1）猛攻，作为其历史虚无主义的直接罪证；对于（2）的辩护，质疑该老师的动机，指出就数据可靠性做文章是抹杀日本侵华历史罪状的惯用套路，无论如何都在为历史上的侵略战争翻案，为“反华势力”张目；对于（3），他们进一步指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存在“客观”的反思，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民族主义，即牢记中国被侵略的历史，从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笔者认为，这种论调存在两重歪曲：（1）逻辑上的歪曲：从先验的中式“政治正确”出发，任何对于其立论基础可靠性的讨论，不论是否符合事实，不论是否出于政治目的，都是在反对我方、为敌人利益服务，而且最可

恶的是某些“专家学者”在客观性的幌子下“偷运”自己的翻案阴谋。虽然“敌对势力”确实会这么做，但反推出这么做的都至少潜在地是“敌对势力”并不成立；相反，对“敌对势力”的泛化往往是统治者定向打击威胁自身合法性者的策略。（2）实质上的歪曲：混淆阶级观点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混淆百年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和当今自身成为帝国主义的中国。我们同样强烈批判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重罪行，但问题在于，当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系列政治宣传完全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将敌人指向外部以凝聚民族认同，从而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2、事件的第二阶段：“告密者”还是“举报者”

在关于宋某某观点的争论基础上，随着事件发酵（宋某某被学校开除、曝光者动机被质疑），争论进而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学校开除该教师是否正当？（2）学生录视频传到网上“举报”是否正当？

自由派、民主派倾向于认为：即使该教师言论有不妥之处，但她并非出于恶意，而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范围，学生应该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通过网络举报的方式曝光非公开场合的言论，借助公权力介入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俗称的“赵弹打击”），是非常恶劣的行径。这种有利可图的方式一旦得到许可，就会引发更多人“公报私仇”，导致大举报的恐怖。

官方和民间的民族主义势力则针锋相对：既然该教师的言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触碰红线的，举报就有了合法性。他们认为教学场所属于公开场合，与网络无异，而且作为教师传递错误价值观罪加一等，因而“学术探讨”不构成为之辩护的理由；相反，这位学生（尽管想要“五十万”！）才是不畏权威、坚持正确原则的“吹哨人”！

需要指出，尽管前者经常不假思索地将这类言论审查和举报行为与“文革”、“极左”等标签关联起来，并且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法权来思考权利和

自由，但是他们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当今专制政府的统治策略：以国家与民族利益这一最高层次的“例外”来取代个体“最低限度的自由”的合法性，从而扫清取得市民社会层面认同的阻碍。但是，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今的国家行为以及公众舆论对立的实质，才能走出与民族主义同样简化的自由主义归因（比如“极权主义”、“多数人的暴政”）。

二、当今中国舆论场的阶级斗争形势

实际上，与宋某某同类的事件近年来已经在互联网上屡屡发生：比如，疫情后对方方及其“同党”之言论的大肆鞭挞，以及前日罗昌平律师因侮辱志愿军烈士被警方刑事拘留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此外，从这些事件中官方表态以及网络舆情的分化来看，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已经很清晰，足以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基本的判断。

以罗昌平事件为例。在罗昌平被警方刑事拘留后，自由派人士替他喊冤，觉得他言论虽有不妥但不至于获罪，并试图以他之前作为（南方系）媒体人在反腐上的贡献为其辩解。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小粉红之外，“有良知的”左派同样痛斥这些“公知”、“精英”对革命历史（或“人民的历史”）的污蔑，而对于警方的惩罚，他们迫不及待地代表“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这类事件表明，历史绝非一系列与当下无关的事实，而是始终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相关，被不同阶级集团策略性地唤起、遮蔽或重释以服务于特定的现实目的。如今，随着中国舆论界的重新政治化——“理客中”的退隐和“立场优先”的极化，这一命题正越发得到舆论场上对立各方的公认。然而，由于缺乏革命左派的声音与科学的阶级分析，这些经验现象只是以歪曲的方式反映了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

对立的一方面是自由主义阵营，它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老一代自由派，典型代表是（南方系）媒体、部分律师和学者，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春风

之下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构成了互联网的第一批居民，他们把文革视为恶政的代表，而要求基于市场的民主、自由与权利，希望市民社会挣脱总体性国家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一群体从势力与合法性上都在式微，只能以“政治自由”这样空洞无力的理由自保，同时强化了他们对“一党专政”全部恶果的信念。其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个较为“年轻”的集团（在成员年龄结构和形成时间双重意义上），其成员以高校学生和进入工作岗位不久的毕业生为主，他们成长在社会矛盾发展到足以自我批判的年代，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水平与高压的生活工作处境之间的割裂激发了他们的受压迫感和民主意识。

对立的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阵营。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民间有急速抬头的趋势，借助中美贸易战这一历史契机正在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能够跃出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通过舆论力量倒逼国家机器出手镇压。具体而言，这其中包括以城市中产和殷实农村家庭为主的“秩序党”，以及更为年轻的“小粉红”——对自身现实地位的不满加上狭隘的视野导致他们迅速投向民族国家提供的巨大合法性。后者显然具有更强的网络行动力，构成了这一系列举报事件的主要民间推动力。国家机器也乐于借助这些民间力量来塑造自身统治合法性、转移社会阶级矛盾，只是要适时防止民族主义的声音走向极端而引起更普遍的反感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与民族主义同时兴起的还有左翼思潮，但主要仍然停留在反资本的层面，对于国家大体上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在这些事件中，”有良知的“左派不遗余力地投入了由国家与小粉红相互呼应和推动的民族主义“圣战”中，把全部精力放在抨击“汉奸买办”自由派、为革命历史正名上，却一个字也不提专制政府如何挪用革命历史的遗产、利用民族主义舆论服务于自身统治。这其中包括两种人。第一种人以老左为主，特别是存在“党内健康力量”之幻想、主张保党救国的分子，他们反而会将揭露中国帝国主义面貌的革命左派与自由派在反专制政府、追求政治自由问题上的

“临时协议”视为“左右合流”；第二种人以小资产阶级的新左派为主，他们要么对当前国家性质认识不清，要么慑于国家机器（特别是“普鲁士审查制度”）的威力，不敢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运用于现实中，只能将矛头对准已经成为“纸老虎”的次要敌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天真”地以为他们的文章至少还是在宣传左翼思想，因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正功”。

我们发现，当前阶级斗争的格局——当然，是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形式被歪曲的——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神兔相争，中特得利。无论是站在“左”的立场上揭露这类言论采取错误的政治立场，还是在自由派的立场上捍卫言论自由、反对“大举报”，都未能充分察觉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中特承载着矛盾的阶级使命：名义上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际上又要维护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当然最主要的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可以一边扶贫攻坚、打击大资本，一边扩大市场经济、打击工人维权，因此不同阶级、集团和政治派别，似乎都可以从国家的表态中找到些许合法性，并且借此唤起国家机器来打击市民社会层面的“敌人”，从而使得“波拿巴国家”的行政力量与合法性不断壮大。

同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了捏合国内彼此对立的阶级的最主要意识形态。由于中共的合法性奠基于革命历史实践中承诺的共产主义理想，它与现实情形之间的巨大落差很容易使社会不满加倍地爆发出来，乃至从中国革命史中寻找启发当前斗争的政治资源，从而挑战党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由于其历史特殊性同时包含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当阶级矛盾成为中特意识形态的最薄弱环节，历史就必须以民族主义的方式重新书写，并且在市民社会中唤起对于历史“正确的集体记忆”。英烈保护法、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党史学习在近年来才格外提上议程，正是这一政治意图的表现。

从全球帝国主义体系来看，甚至可以说，极力渲染国家之间的冲突，本身就是各国统治阶级“神圣同盟”的组成部分：日本政客可以继续美化侵华战争历史及其战犯，声称中国要求关闭靖国神社是断了日本人的民族之根；中国政府同样可以不断“缅怀历史”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借助谴责那些美化侵华战争历史的日本政客，将一切反思民族主义的声音标定为国家的敌人加以打击。由此可见，统治阶级最忌惮的是他们建立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的合法性神话被揭穿，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直接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

三、二元陷阱下，革命左派何为？

可以说，如今中国左派在政治上面临着这样的二元陷阱：或是把特色专制政府视为首要敌人，要求首先彻底改变国家体制，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继续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把资本家及其喉舌（以“公知”为代表）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视为首要敌人，通过清除这些干扰性力量恢复社会主义。前者的政治后果是，它（至少在民主革命阶段）看起来似乎与自由派、民主派过于相近，而且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很容易失去政治合法性与群众支持。后者的政治后果是，诉诸国家的力量来遏制资本主义，遮蔽了这一事实——官僚资产阶级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最大支柱，或许能在一定时期内争取到“人民”，却使自身滑向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上述关于中国革命遗产的解释争夺战？改革开放以来，自由派以看似去政治化的“后革命叙事”淡化这段历史的救亡色彩，而接续五四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如此才能夺回他们因无力承担不发达地区实现摆脱殖民统治、构建民族国家与推动现代化的任务而错过的历史位置。对此，左派需要创造性地激活革命遗产来打破“后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屏障，但中国革命的历史资源为革命左派与中特官方以及民族主义者所共享，同样是他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焦点。在这个关键的分岔路口，以阶级为核心的解读和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解读，会把趋于沸腾的民意引导向截

然不同的方向：前者才有可能通向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通向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马列主义者在舆论场上的缺席，导致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二元陷阱。正如 20 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所示，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无力解决社会矛盾而丧失力量，国家机器的镇压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有组织的政治表达，使得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将无处发泄的国内阶级矛盾引向同样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完成了资产阶级常规制度无法承担的维系自身统治的任务。如今“小粉红”群体与中特的“合谋”，很可能重蹈这一覆辙。

最后需要指出，革命左派应避免以合法方式直接卷入这场历史争论中。首先，这在极化的舆论场上往往导致自己被卷入上述虚假的二元陷阱。特别是按照老左的方式，与国家结盟而空洞地反对“资本”，反而有助于壮大专制政府的力量。其次，无论革命左派能以多么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方式阐释中国革命历史，这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性质以及寻找出路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可能造成一系列误导作用。正如列宁告诫我们不能混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百年前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中国与当今作为意在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已经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而中特恰恰要造成以前者掩盖后者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重点应该放在揭露当前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上。最后，相比于历史解释权的争夺，更实质的问题在于国家机器的做法：专制政府以“政治原则”的名义任意打压威胁其统治合法性的声音，借此在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群众中建构自身合法性。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要求推翻专制政府的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因此应该在这类事件上支持争取政治自由、反对专制政府、反对“小粉红”等沙文主义力量的斗争，同时将其与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者受到的压迫联系起来，揭露自由派和民主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彻底性。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读者来稿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主要原则之一是：

革命必须分阶段且不间断地进行

也就是说：将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统一起来。承认第一点而否认第二点，就会在上一阶段革命成功之后陷入骄傲自满的境地甚至成为下一阶段革命的对象。承认第二点而否认第一点，就会使得我们忽视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失去现阶段革命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

如果我们把我国革命的进程比作一根弹簧，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这根弹簧被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压制到最低点的时候了。一切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无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农民的反抗行动都被严厉镇压，社会显示出一种病态的“稳定”和“和谐”。目前的形势处于革命低潮，甚至是最低潮。

但是，弹簧被压制到最低点绝不意味着它不能弹的很高，甚至能远远超过上一轮（1968年：文革最高潮）所能达到的高度。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被压制的力度是空前的，压制所采取的暴力手段之强大也是空前的，因此也必然为这根弹簧积蓄了强大的弹性势能，使其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可能直接“弹”入共产主义。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每一阶段的革命过程中都存在着向下滑落的可能性，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承认我国革命的巨大潜力绝不意味着否认革命必须按阶段进行的绝对性。如果我国革命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么我国革命按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的不同，应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

今后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与历史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会有许多相似之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标志是打碎了旧的国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与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多次反复的斗争，以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实现革命胜利。

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样描述：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与一百年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日益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俄国面临的目标类似，是推翻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另一方面，今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领导的上一轮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在国际意义上属于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左翼的革命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认为：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并非如刘少奇等人所断言的那样，需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而是必须立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于旧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已经被打碎，新型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因此消灭城市旧资产阶级的任务大体上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但也绝不排除镇压反革命的暴力手段），即有可能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标志是城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

另一方面，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因此必然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政权，而先锋队内部的走资派必然会采取一切方法和手段阻碍这一进程，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走资派的斗争将会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对抗性矛盾。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有三点：**第一，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第二，废除作为阶级镇压**

工具的警察制度。第三，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已经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似乎“平等”就实现了。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则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走资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认为，这一阶段国家正在消亡，但是还没有完全消亡。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会立即彻底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不会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同于旧的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保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保卫资产阶级法权，因此是正在消亡中的资产阶级国家）。

第三阶段：共产主义革命

从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刻起，我们并不能稍稍暂停我们的脚步，感慨一下我们已经走过了多远的革命道路。我们必须迎接新的更困难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和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胜利的标志是进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仍然面临着继续革命与复辟力量之间进行的长期斗争。由于历史上还没有地方实际进行过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步骤仍然需要更多实践才能加以描绘。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同志们，让我们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为打倒专制政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而团结奋斗吧！

列宁如何制定纲领

纲领集中表现一个政党的面貌和主张，能否制定科学的纲领，是判断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恩格斯指出纲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

“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恩格斯：论美国工人）可以说没有纲领，就没有政党，没有科学的纲领，就没有成熟的政党。因此一切有政治抱负的团体都应努力提出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纲领，并在纲领的基础上向更高形式的政党发展。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面临着提出革命纲领的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回顾列宁在革命早期对党的纲领问题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列宁在 1905 年革命之前对纲领问题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95-1899 年监禁与流放期间个人思考纲领的阶段；1901-1902 年《火星报》编辑部制定党纲草案的阶段；1902-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前后围绕纲领斗争的阶段。

先看第一个阶段。1895-1899 年列宁先经历了 14 个月的单独监禁，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这是列宁个人事业的低谷期，也是俄国革命事业的低谷期。列宁于俄历 1895 年 12 月 8 日夜被捕入狱，第二天就立即着手起草《党纲草案》，并于翌年的 6-7 月完成《党纲说明》，两份文献后被合编为《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这份条文简略的纲领体现了两个要点：一是排除民粹主义影响，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灾难性后果；二是明确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以争取政治自由为首要任务。

1899 年列宁在流放地写就《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通过对比劳动解放社 1885 年纲领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在原则上明确了纲领的结构和内容，对于我们今天制定纲领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纲领应该表述我们的基本观点，明确规定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提出一些最迫切的要求，以

便确定鼓动工作的范围，使它步调一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争取实现零星小要求的局部性片段鼓动提高到争取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要求的鼓动。”

此文对于今天的特别重要意义是列宁反驳了反对制定纲领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相比于发展地方组织和从事具体工作，制定纲领并非迫切任务；一种认为制定纲领会带来党内的分歧争论。第一种观点没有认识到正是运动本身要求超越过去分散的“手工业”小组，通过制定纲领使运动发展到更高水平；没有认识到国内相当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觉悟工人需要通过纲领来巩固联系；没有认识到纲领能澄清来自敌人的污蔑和群众的误解，亮明自己的政治旗帜。第二种观点以内部会出现争论为由而回避制定纲领，没有意识到分歧争论不是回避纲领的理由，而正是制定纲领的理由。思想不会自然而然统一，纲领也不会水到渠成地出现，制定纲领的过程正是在争论中逐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同时只有制定纲领才能区分实质分歧和枝节矛盾，使不存在实质分歧的革命力量在纲领旗帜下团结起来。今天中国左翼中持第一种看法的不少，持第二种看法的也有。他们或是认为当前的迫切问题是在白色恐怖下保存好自己的地方小组，是从事具体的宣传工作或学生、工人的组织工作，认为运动的低潮期讨论纲领为时尚早；或是认为各地方小组各有渊源传统，各有工作思路，对能够形成纲领心存疑虑不抱希望，为了避免结束，而避免了一切开始。可以看到，这些反对意见丝毫没有逾越列宁的回答。

再看第二个阶段。《火星报》创办后的 1901 年 4、5 月间列宁即开始再次起草党纲初稿，在编辑部内部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先后两个纲领草案提出批评，并提出自己拟定的草案，经过反复修改编辑部最终形成一份吸纳了列宁观点的共同纲领草案，提交给党的二大。两相对比，普列汉诺夫草案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将纲领写成了教科书，一般空泛地谈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使用大量的理论术语。列宁草案则从俄国的资本主义谈起，强调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带来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沦为无产阶级的灾难性后果。二是模糊革命动

力，只谈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将工人阶级从全体劳动者中凸显出来，从而模糊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今天我们避免普列汉诺夫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并不困难，在起草纲领时要注意强调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阶级的命运，避免纲领的教科书倾向。但要避免第二个错误并不那么容易，需要严格区分阶级界限，厘清政治派别的阶级属性。纲领中不强调无产阶级的危害主要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区分开来。在俄国是社会民主党和模糊农民与无产阶级的民粹派，在今天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同其他各色派别，如自由派、乡建派和中特，在纲领表达上要避免同这些派别混淆。当然只依靠纲领并不足以保障无产阶级政党的纯粹性，仍然不能在革命队伍内部，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口头上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分开来。在俄国是之后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中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和其他各色装点门面的左派，这在理论上要求我们坚持阶级概念的科学性，尤其是严格区分从事非生产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实践中要求我们注重对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革命组织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并吸纳工人成员进行阶级成分改造。

进入第三个阶段。1902-1903 年社会民主党二大上就《火星报》编辑部起草的党纲草案产生激烈争论，列宁的斗争分为两部分，一是回击各类机会主义分子就纲领的争夺，二是回应关于土地纲领的各种质疑。工人事业派反对灌输论，主张社会主义意识会在工人中自然形成，经济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持社会改良论调，列宁一一驳斥。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表明，纲领起草在逻辑上有一个从团结各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专制政府的派别小组到与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过程。我们目前处于各革命小组分离的局面，还处在这一过程的前一阶段，因此要制定一个尽可能将主要的革命小组团结起来的纲领，如果后面出现分歧以至于影响到了革命队伍的一致行动，再来对纲领进行有利调整。尽管目前各地方小组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团结起来以克服小组阶段带来的运动不充分发展的的问题对于整个革

命事业更为重要。当然，这个纲领不能违背以下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能够坚持先锋队走向工人阶级的群众路线，反对先锋队独自决战的政治冒险主义。

以“归还割地”为核心的土地纲领草案在二大上引起了各种质疑，主要指责是认为归还割地将加强农民的小私有制。列宁具体分析了此时割地作为农奴制残余的基础，归还割地所加强的小私有制是以相对农奴制的进步意义出现的，而非相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落后意义出现的。在随后 1905 年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广大农民的革命性大大向前，“归还割地”的纲领进一步发展发展为“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回过头看，列宁在 1903 年对农民的保守估计说明在未经过大规模革命检验之前，提出科学的实践纲领的艰难。这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各阶级内部情况，将今天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各自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诉求提炼为纲领。虽然二大纲领中的土地部分被三大修正，虽然随后围绕党章第一条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令人痛心的分裂，但二大毕竟通过了由《火星报》编辑部起草的党纲草案，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党自 1898 年成立以来终于有了一份比较成熟的纲领，使原来思想混乱的党员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从而将这个党真正建立了起来。

中共建立伊始也就党纲问题产生过激烈斗争。一大代表们在“是否允许党员当官”“是否建立集中制政党”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虽然一大纲领最终战胜了李汉俊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政治路线、建立集中制政党的组织路线，但在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和策略方面没有形成正确认识。直到中共二大，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亲自指导下才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可以说中共一大纲领是基本成功但不成熟的纲领，其成功原因在于坚持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经验；其不成熟原因在于只知道列宁的建党思想而不了解列宁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帝国主义理论。中共的经验表明，越是完整彻底地坚持列宁主义，就越有可能少走革命的弯路。在未来制定纲

领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思想派别、不同小组、不同观点的斗争，在纲领的条文表述上也难免产生针锋相对的分歧，在制定实际纲领时也难免进行类似列宁对土地纲领的调整，但严整全面地继承过去的革命经验和科学理论，能使我们最大可能少走弯路，最大可能少犯错误，最大可能统一思想，最大可能减少未来的分裂。

形成一份成熟的纲领需要多久？从 1895 年列宁写就《党纲草案》到 1903 年二大，需要 8 年；如果从 1885 年劳动解放社纲领算起，则需要 18 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比列宁高得多的历史起点，必将缩短这一历史进程。列宁之前并无列宁，列宁只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起点，只有法国大革命、1848 年革命、巴黎公社三次革命作为革命经验起点，只有民粹派和劳动解放社作为现实起点。今天我们则在此基础上以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依据，以俄国和中国两轮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参照，以中国左翼过去几十年进行的以佳士运动为代表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当然今天的中国革命力量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程度还远远落后，进行理论斗争，创办全国政治报，促进地方小组的思想和组织统一，最终实现政治上的实质统一，正是列宁所揭示的改变这一落后局面的科学道路，而制定纲领则是这条统一道路上绕不开的关键环节。

列宁的第一份纲领草案是在彼得堡寒冷的监狱中写就的，用牛奶写在书本中的字里行间，交由前来探视的克鲁普斯卡娅等人传出。今天我们显然拥有比狱中列宁更好的思考纲领的条件，一切有志于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个人和团体都应将纲领作为迫切问题来思考，迅速行动起来。

书评：《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我们热烈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认为它类似于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理论的严整性和材料加工的程度来看，这本书比起列宁的名著来有一些差距，但其面向当代中国斗争的现实针对性却是任何经典著作都不能代替的。如果我们的读者近期只有阅读一本五百页左右的著作的时间，我们会建议阅读《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篇书评里，我们将介绍这本书的突出优点，让大家意识到阅读这本著作的必要性，还会提出一些可以改善的方面，以便作者再版时修改。我们认为，即使存在这些可以改善的地方，这本书仍不失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我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词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科学的。每个持革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研究这本书，然后有意识地传播这本书。

这本书的第一个突出的优点，是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革命性。特色黑帮的御用文人，用所谓实事求是代替了革命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反而很少能做到实事求是，因为辩护性的学说总是需要歪曲现实。这本书则由于坚持这一活的灵魂，既不为官家辩护，又不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尚未组织起来而辩护，于是能够进行相当多科学的分析。例如该书第一章“经济篇”对中特经济必然走向滞涨的分析，第二章“阶级分析篇”对作为新工人核心的制造业工人的分析，以及对资产阶级两部分相互关系的分析，第三章“时代篇”对塔吊工人斗争局限性的分析，第四章“时代篇”对中特对外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分析，第五篇“思潮篇”对民族主义和红中网部分错误观点的批判，都体现着革命性这一活的灵魂。这些分析和批判，热情地介绍了工人阶级不屈的斗争，但并没有为这些斗争的自发性和不彻底性去护短，从而让人看到了未来的任务正是在于通过觉悟分子团结起来的努力把这些初步的斗争提高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水平。这些

分析和批判，严肃地探寻了中特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没有丝毫为之辩护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在装点门面的“左派”跟着中特黑帮大肆欺骗群众的今天，是极为可贵的。

这本书的第二个突出的优点，是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安排了全书的结构。从中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到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再到参与全球帝国主义争霸，最后是与这些经济、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斗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所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标题是编辑所加，列宁自己所拟的标题是《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最终成为全书的副标题。因为除理论章外，列宁全书所讲的只是工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即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书中并未有与经济部分相匹配的篇幅。《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则平衡地讨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以阶级斗争的线索一以贯之。这样，阶级分析有了经济上的说明作为基础，又为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讨论提供了依据。此外，中特经济产能过剩所造成的资本输出的必然性，即第一章“经济篇”与第四章“时代篇”之间的联系，也是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够察觉到的。

这本书的第三个突出的优点，是它能够直面和回应马克思主义者中意见并不统一的问题，特别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中特黑帮用民族主义来掩盖国内的阶级斗争，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使得相当多的“左派”也染上了民族主义的病毒。民族主义，或者说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俄国历史上，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经过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等多个阶段才最终发展为民族主义。而当代中国，由于矛盾的难以调和，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直接采取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这些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者，实质上不赞成推翻中特专制政府的革命主张，试图进行改良。其主要依据，就是中美斗争中工人阶级与中特法西斯有美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敌

人。于是，这些主张改良的民族主义者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形成了直接对立的立场：民族主义者声称中国是一个半外围的国家，不是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官僚垄断资本为经济基础、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这本书直面这一问题，并且以关键的数据证明了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这对于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好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坚持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原则，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这本书的第四个突出的优点，是它利用了相当丰富的、全局性的或代表性的统计材料，使得其结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例如在第 96 页，作者分析出 2018 年中国制造业 500 强净利润为 8177 亿人民币；在第 100 页，作者指出 45 家商业银行利润合计 14600 亿元，是制造业利润的将近两倍。这样全局性的数据对于说明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帮助读者看清经济的全面金融化有很大的帮助。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第 146 页、147 页和 275 页关于制造业工人的统计材料。从第 146 页的表格中我们得知，制造业工人在 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占 30% 左右，与批发零售业和居民服务业的 10% 左右相比，以及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 6.5% 左右相比，仍然是比例最高的部分。从第 147 页的表格中我们得知，30 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占比在 30%。第 275 页的图表告诉我们，制造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一直占据最高的比例，虽然其它行业斗争的比例在不断升高。这些统计数据提醒我们，在重视快递业等新兴行业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制造业工人的斗争潜力。在第 365 页，作者指出截至 2018 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排名全球第三（前两名是美国和荷兰），流量排名全球第二（第一名是日本），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结论。李钟瑾（音）和科兹发表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上的文章“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Is China Imperialist? Economy, State, and Insertion in the Global System)，论证中国没有帝国主义行为。这篇文

章更多地引用中国对赞比亚等国家中农业这样个别行业投资的论据，比起《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所引用的较新的全局性数据来，就显得既陈旧，又没有说服力。当然，在我们推荐的这本书中，有一些数据，由于统计口径并不是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是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来划分的，因此将引起很多的争议。在这些有争议的地方，这本书也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这本书的第五个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解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政党这一阶级斗争的高级形式，才能经由对工人阶级群众的教育和组织，走向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书中分析了中国经济走向泡沫破裂、滞胀危机的必然性，分析了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各种错误思潮和糊涂见解，但始终没有忘记：仅仅经济危机、自发斗争和意识形态批判都不能带来社会主义，而必须走集中制政党促进无产阶级群众觉悟和团结的老路。作者不止一次的引用列宁的如下箴言：“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这是列宁一篇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并非广为人知的话，没能入选《列宁选集》，却道出了列宁主义的菁华：只有经过原则坚定的阶级意识的教育，工人阶级才能觉悟和组织起来，才能改天换地。这本书正是通过这一尺度去判断工人阶级斗争所处的阶段，才能得出既不盲目乐观、又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结论。

这本书也并非没有缺点，但我们指出它的缺点，不是意在否定这本书的价值，更不是阻止这本书的传播。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即使存在这些不足，这本书仍然具有进行原则坚定的政治教育的巨大价值。在没有更好的著作出现之前，它始终是想获得关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科学知识的人的必读书籍。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为了让作者更好地再版它。

这本书的第一个瑕疵，是一些理论上的偏差。书中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偏差比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要多，在危机理论上比较明显。在第4页作者写道：“投资本身也是一种需求，当两大部类的再生产保持一定比例，在工农对生活资料消费不足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保持扩大再生产的。”作者注明了这是引用北京大学教授方敏的观点，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表明作者赞同其观点，至少默认它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方敏的论文欣赏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方敏自己也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曾经这样批判杜冈的观点：“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社会产品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二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列宁全集》第4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列宁对杜冈的批评，是作者应当注意的。而且这个错误论点，在全书中没有任何支配实证材料的作用，反而为几乎所有的实证材料所反对，实在没有保留它的必要。在第一章的结尾处，作者用老龄化作为资本主义难以持续的论据，也是不足为凭的。由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相对独立、又最终受限于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发展，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并且还会有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断言到2050年就不再有资本主义繁荣的国家，是不够谨慎的。在类似于第三产业等等这样的概念的使用上，也需要进一步转换成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数据使用上自然也需要相应地转换，而不是沿用官方统计的分类。这在我们讨论这本书数据方面优点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过了。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也有的一处偏差，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发生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第425页作者写道：“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反对民族主义是对的，但这个论据是不对的。列宁与民粹派论战多年，要求承认沙皇俄国是资本主义，但并不把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看作沙皇俄国的主要矛盾，不认为俄国将爆发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隐藏在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面纱之下的是其民主主义的要求。这种要求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但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却要进行以反对专制制度为核心要求的民主主义革命，这种要求看起来不够激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历史上，都是正确的。或许是因为理论上的这种见解，让作者在正确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关系后，并没有得出如下的结论：专制制度必将灭亡，而无产阶级应该领导造成这一灭亡的民主主义斗争。

这本书的第二个瑕疵，是没有谈到佳士抗争。编写组所写的前言注明的日期是 2019 年 12 月，距离 2018 年夏天的佳士抗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时间，书中也引用过 2019 年的材料，因此作者是有可能把佳士抗争写进去的。书名是《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之所以没有写佳士抗争，也不会是因为佳士抗争不是阶级斗争。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认为佳士抗争不具有类似通钢事件和南海本田罢工那样的典型性，认为佳士事件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学生。这并不是一个好理由，正如要写《旧中国的阶级斗争》时认为五四运动主体是学生就不写五四运动一样。佳士抗争虽然有先锋队独自决战的冒险主义错误，但仍然是一场自觉的阶级斗争。从其觉悟程度来讲，要比本田罢工这样的自发工人斗争还要高。而对于目前工人斗争自发性需要提高到自觉的水平上来，作者是有清晰认识的。实际上，如果把佳士抗争写进去，就能描绘出新时代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整体图景：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工人斗争陷入经济主义，没有工人支持的知识分子斗争陷入冒险主义，目前阶段只有走知识分子教育和组织工人的道路才是科学社会主义。

这本书的第三个瑕疵，是分头写作带来的各部分协调工作并没有完全完成。各部分写作风格和语言习惯保留着各部分作者明显的个人痕迹。虽然这是集体写作很难完全避免的问题，但在这本书中有些过于明显。即使这并不影响著作表达正确观点，但我们仍然希望统稿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协调各个

部分的风格，让这部著作像《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看起来是一部经过精细加工的杰作。

瑕不掩瑜。我们希望这部优秀的作品能够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讨论，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史上留下它应有的影响。

论我国革命（四）——帝国主义时代与我国的统治阶级

读者来稿

一、我们所处的时代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就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一般过程就无法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革命的敌人是谁。而要认清我国革命的对象是谁，首先要认清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正如列宁在一百年前《帝国主义论》中所说：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有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帝国主义论》)

在《帝国主义论》的结尾，列宁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二、我国的统治阶级

大体上讲，中国的统治阶级分为两部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也就是网友们经常说的“赵家人”。垄断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之间的最主要的区分是垄断资产阶级通过金融资本的方式实现了垄断，并由此获取超额利润，并且不断兼并中小资本。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等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列宁《帝国主义论》)

中国的资产阶级媒体《财新》在一篇关于最近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文章《监管层要求合理发放并购贷 出险房企偿债能力有望提升》中就不得不承认房地产行业垄断资本的兼并正在加剧：

国泰君安发布于 12 月 5 日的研报称，监管层的集中表态显示，和以往“以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不同，当下政策并未放松所有房企的融资，而是鼓励优质房企进行并购。这意味着行业将持续优胜劣汰，被淘汰的企业难以再通过融资重返市场，行业门槛将大幅提升。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定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突围》中，中福集团董事长林满江和长明集团董事长傅长明就分别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傅长明与他的“杏园三结义”的兄弟荣成钢铁集团董事长钱荣成之间的矛盾正是源于傅长明试图以低价收购荣成钢铁集团所引起的。

就像电视剧《突围》中所描写的林满江与傅长明之间的关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在贷款、海外投资、IPO 上市、合规和税收审查等方面都需要仰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其既服务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维护自己的利益，共同疯狂攫取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需要加以着重指出的是：《突围》中林满江和傅长明的结局不过是经济形势恶化、利润率下降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绝非“人民的胜利”。“反腐”立功之后的齐本安取代了林满江，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反而得到了加强。

表 2.13：中企 500 强和民企 500 强分结构对比

	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纳税（亿元）	员工数（万人）
中国 500 强	711700	32029	40200	3194
263 家国企	509008	22494	32526	2460
237 家民企	202692	9535	7674	734
民营 500 强	281932	11321	10254	951

表 2.14：中企 500 强分所有制结构对比

	收入	净利润	资产	净资产	纳税	员工数
国有占比	71.52%	70.23%	87.39%	80.52%	80.91%	77.02%
民营占比	28.48%	29.77%	12.61%	19.48%	19.09%	22.95%

中国 500 强企业中 263 家为国有企业，其收入和利润占比超过八成

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房地产。垄断资产阶级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垄断地租的方式疯狂进行房地产投机活动，攫取了大量暴利。而另一方面则是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沦为“房奴”，不得不背负数十年沉重的房贷负担，或者是为了租房而将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得到的工资都交给房东。

企业名称	2021 排名	排名变化	2020 排名
万科	1	↑ (2)	3
恒大	2	↓ (1)	1
碧桂园	3	↓ (1)	2
中海	4	↑ (1)	5
融创	5	↓ (1)	4
保利	6	—	6
龙湖	7	—	7
华润	8	↑ (1)	9
世茂	9	↑ (2)	11
新城	10	↓ (2)	8

中国十大房地产企业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作“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列宁《帝国主义论》）

我们再来看看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根据中国福布斯富豪榜 2021，在不考虑“隐形富豪”的情况下，中国排名前十名私人资本家总共拥有

27158 亿人民币的惊人资产。这些资产完全来自于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的剥削。

排名	姓名	财富（亿元）	财富来源	年龄	居住地
1	钟睺睺	4,244	农夫山泉/万泰生物	66	杭州
2	张一鸣	3,825	字节跳动	38	北京
3	曾毓群	3,272	宁德时代	52	宁德
4	马化腾	3,162	腾讯	50	深圳
5	马云	2,673	阿里巴巴	57	杭州
6	黄峥	2,132	拼多多	41	上海
7	何享健家族	2,067	美的集团	79	佛山
8	魏建军家族	1,996	长城汽车	57	保定
9	丁磊	1,932	网易	50	杭州
10	王卫	1,855	顺丰控股	51	深圳
11	杨惠妍家族	1,790	碧桂园	40	佛山
12	秦英林家族	1,616	牧原股份	56	南阳
13	庞康	1,539	海天味业	65	佛山

最近刚刚去世的解直锟，是资本帝国“中植系”的实际控制人，其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一万亿。掌握了四大金融公司和持股超过 30 家上市公司。曾经疯狂一时的资本帝国“明天系”、安邦集团、海航集团和现在依然强势的“宝能系”所控制的资金规模甚至超越了解直锟。我们可以看到，在私人垄断资本的背后，往往闪现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魅影，一些高级官僚，通过“白手套”的方式，操纵名义上的私人垄断资本，实现对巨额资本的控制和代际传递。一个令人熟知的例子是周永康家族。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周永康通过现年 42 岁的周永康长子周滨、周滨岳母詹敏利、周永康的弟弟周元兴、弟妹周玲英、侄子周峰等人，控制了一个资产超过 900 亿的资本帝国。

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列宁《帝国主义论》）

三、我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历史

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轫于解放之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逐渐成熟起来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前，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走资派之间反复斗争的历史过程，这一斗争以无产阶级的彻底失败和走资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走资派领导的共产党在城乡大力扶植私人资本的同时，自身蜕化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集体占有以国有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资料，每个成员按自身在党国体系中的级别享有相应的收益；同时在政治上垄断了一切权力，并以政治吸纳（人大、政协）的方式将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纳入到政权范围中，形成了中国的统治阶级。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子女不甘心现有的财富分配，通过“价格变动”、“利息变动”、“汇率变动”等种种手段巧取豪夺，将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放入自己囊中。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以邓朴方所在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为代表的光大、农信、康华、工商、中信五家公司

被称为盛极一时的大“官倒”，其余各地还有更多的小“官倒”。据统计，大大小小的“官倒”获得的垄断租金总额高达 4000 亿元人民币，其中 40% 落入与统治阶级成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引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由于其对国有资本只有控制权，而所有权只能以集体所有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能通过直接合法的方式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集体占有权传递给下一代。因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个体必然存在着将国有资本私有化的动力，正是这一动力导致了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

另一方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在私有化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和分歧。首先，私有化过程对于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并不是一个本阶级成员平均分配国有企业生产资料过程，而是一个极端不均衡和矛盾重重的过程。因此，私有化过程必然导致已经或者将要分到较大蛋糕的阶级成员与利益相对受损的阶级成员之间的冲突。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关于私有化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在苏联表现为八一九事件，在中国则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之争。最近发生的司马南举报联想涉嫌“国有资产流失”是这一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最新表现。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全盘私有化也许符合一部分本阶级成员的利益，但是私有化之后无法形成庞大的独立的垄断资本集团，因此无法与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也就无法掠夺海外剩余价值，不符合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打左灯，向右转”的情况。一般而言，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僚由于其远离经济领域，在私有化过程中受益最少甚至受损，因此经常表现的更“左”，更支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经济领域的官僚则会显得更“右”，更支持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他们往往借市场化改革之名将国有企业收入囊中，例如上个世纪末一直持续到 2010 年以

后的国企私有化浪潮。这一国企私有化过程由于严重损害了国企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工人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钢事件。而到了今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可以熟练地同时驾驭和使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新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2012 年之后，国企改制基本完成，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隐学”和“显学”并立的新局面。习近平一方面高调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其意识形态等核心内容，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此为“显学”；另一方面又实际重用一贯以新自由主义和尊重市场著称的刘鹤，令其主管经济工作，此为“隐学”。

四、中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 3.2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20 年 12 月）、268.5 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323.2 万亿国有金融企业资产和 43.5 万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2020 年底），是世界上仅次于西方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最大的六家国有银行一年的利润就达到 10763 亿元，占服务业 500 强利润的 41.50%。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自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完全建立在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国有资本总量的迅速增加，另一面则是无产阶级忍受尘肺病、工伤、欠薪、超长劳动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无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从来没有属于无产阶级。

根据中国学者董涛的统计数据，在过去 20 年，中国资产阶级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率大幅上升——在中国工业企业总投资中薪资占比不到 10%，但在同期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接近 50%。中国在珠三角地区的工业生产率提高了约 17%，而工资增幅却仅为 6.7%。此外，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53.4% 降至 2005 年的 41.4%。从 1993 年至 2004 年，中国国有企业和重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也在快速下降，从 240% 降至 43%。如果中国想继续维持自己的帝国主义强权地位，就只有继续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为了与美国、日本

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竞争，中国必然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落后国家，由此也必然将剥削全世界劳动人民。

引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在残酷剥削本国无产阶级的同时，由于国内资本过剩，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将目光转向了海外。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使用外资的比值从2011年的0.63猛增到0.77。从2014年开始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到2016年中国资本输出达到顶峰，直接对外投资额高达1961.5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13.51%，位居全球第二（第一是美国，占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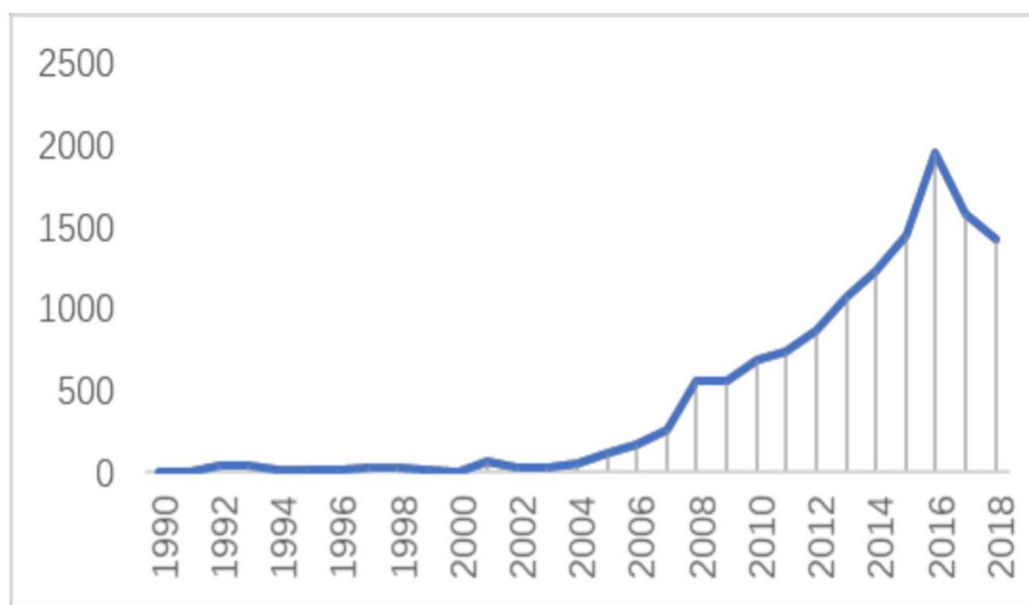


图 4.39：1990-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亿美元）¹

来源：《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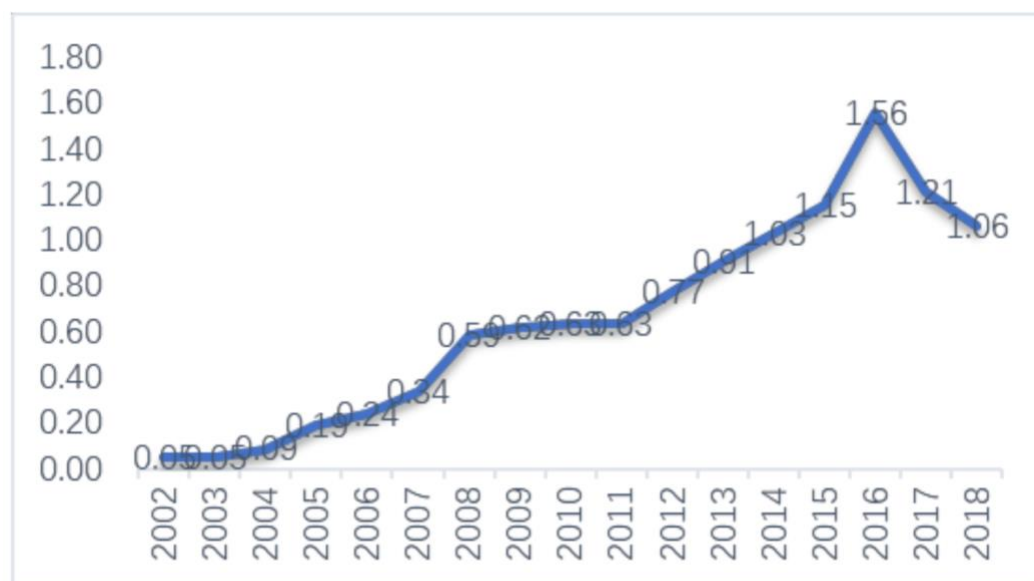


图 4.38：1990-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³

来源：《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输出”这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特点做了清晰地刻画：

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将海外无产阶级身上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来收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人贵族”阶层。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

额和整个世界观来说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列宁《帝国主义论》）

自 2012 年以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加强所谓“意识形态工作”，通过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来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给群众一种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错觉，同时煽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帝国主义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这种宣传也可以警告统治阶级中一些成员个人的私有化行动，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意识形态在国内为国有资本结束医疗、教育和分配住房等工人福利，以最大程度攫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在国外，所谓全球化和市场化主张则为出卖本国无产阶级利益，与西方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暂时的妥协，共享中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打下了基础。

这一方面的具体表现为中美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几乎答应了美国政府 90% 以上的要求，同意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同时向西方金融资本开放中国银行、保险、证券和电子支付等金融领域。这一协议本质上是**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西方金融资本达成的关于如何合作疯狂掠夺中国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协议。**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世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过去和未来都可能出于种种目的而达成一些妥协性暂时契约，例如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这些暂时的协定既完全无法被用来否认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也完全无法论证各帝国主义之间像考茨基所认为的“超帝国主义”一样，可能实现“永久和平”。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

“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 是因为

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以获取利润；而且他们必须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在民族问题上，特色黑帮彻底抛弃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基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而代之以新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掠夺；以“扶贫”为名强迫少数民族农民变成工业劳动力，从而更大程度榨取少数民族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打压少数民族自己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高压政策，通过“再教育营”等一系列暴力手段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运动。

中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残酷压迫正是中国目前民族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正如列宁所说：

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注：《金融资本》第 487 页。]

对此还要补充到是，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的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列宁《帝国主义论》）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是现阶段革命的主要敌人。